《波德莱尔》
（法）帕斯卡尔·皮亚 著
何家炜 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12年3月

帕斯卡尔·皮亚（Pascal Pia，1903-1979），法国作家、记者、学者，著有《波德莱尔》（1952）、《阿波里奈尔》（1954）、《地狱之书：从十六世纪到今天》（1978）等。他于1938年开始新闻生涯，加缪曾把《西西弗神话》题赠给他。

皮亚是一位坚定的虚无主义者，是最“平静地绝望着”的人。他将文学置于一切之上，并认为只有一种东西高于写作，那就是：沉默。在他的晚年，他要求保留“虚无的权利”，拒绝别人谈论他，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写他。

【编译者言】

虚无的权利

“我自信有一天我所写的一切都会畅销。”波德莱尔在1860年10月11日给母亲的信里这么写道。那是《恶之花》出版后的第三个年头。

那时波德莱尔三十九岁，离去世还有七年。

尽管在开篇《致读者》一诗中，波德莱尔就称读者为“虚伪的”，他显然还是相信，即便同时代无人真正赞赏他，但后人总会理解他并欣赏他的诗。

时隔近一个世纪，帕斯卡尔·皮亚于1952年出版了评传《波德莱尔》。中间经历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、美好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艺术爆发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用波德莱尔的诗句来说，“巴黎已不是昔日的巴黎”。

那一年，皮亚已经是个四十九岁的中年人；此时离他的第一本书《发情的缪斯及其他诗歌》出版已相隔二十四年。这本色情诗集在诗艺上的成就自然无法与《恶之花》媲美，但在皮亚的一生中，比波德莱尔要漫长得多的一生中，它一定有着种种不知其名的影响。

至今无人知晓帕斯卡尔·皮亚（Pascal Pia）这个笔名源自何处。他本名皮埃尔·迪朗，像波德莱尔一样是出生于巴黎的地道巴黎人。在他十二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他跑去了香槟省，后来又到法国中部投靠外祖父。到他回到巴黎时已是二十出头，经常住在蒙马特尔一带的旅馆里。我们知道，波德莱尔六岁丧父，十二岁随再婚后的母亲到里昂去读中学，二十岁被家人遣发去海上远游，中途搭船逃回巴黎，此后二十多年间不断在巴黎城里迁移住所。

所不同的可能是，虽然1848年“二月革命”曾唤起波德莱尔“去枪毙奥皮克将军”的激情，但他身上那个“浪荡子”精神贵族很快对民主浪潮感到厌恶，而皮亚在他的青年时代遭逢的却是德国纳粹占领巴黎。

今天，当我们翻看《西西弗神话》，无论哪个版本，都可以看到加缪的题献：献给帕斯卡尔·皮亚。这是1942年加缪在被占巴黎出版的哲学随笔，书的副题是“论荒诞”。正是在皮亚创办的《阿尔及尔共和报》里，加缪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。他们曾是抵抗运动中最亲密的战友，而在巴黎解放后，也许是这位“入世”的存在主义者与这位“出离”的虚无主义者无法共处，两人的友谊自此结束。那是1947年，在他们共事的《战斗报》，皮亚宣称：“我们尝试办一份理性的报纸，而由于世界是荒诞的，它终将失败。”六年之后，皮亚成为“荒诞玄学社”（亦译作“啪嗒学社”）的“都督”。

波德莱尔曾在《虚无的滋味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放弃吧，我的心；沉沉睡去吧。/……/我从高处凝视这圆圆的地球，/不再寻找一所可栖身的棚屋。”他尝尽了虚无的滋味，却在一句句不朽的诗句中“化泥土为金子”。皮亚在《波德莱尔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“他的《恶之花》所构建的与其说是一部精心打造的作品集，不如说是一位诗人的私密日记，这位诗人异常敏感并被判去培育其感觉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。”

如果说波德莱尔依然以他的诗歌祈望于后人，皮亚则选择悄然地做一个最“平静地绝望着”的人。在战后长长的三十余年中，除了《波德莱尔》，他还写了《阿波里奈尔》、《地狱之书：从十六世纪到今天》等，并编撰了《色情文学词典》。这位坚定的虚无主义者将文学置于一切之上，并认为只有一种东西高于写作，那就是：沉默。在他的晚年，他要求保留“虚无的权利”，拒绝别人谈论他，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写他。

如今，在辞世三十多年后，皮亚的书终于第一次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。《波德莱尔》是法国瑟伊出版社“永恒的作家”评传丛书之一种，名家写名家，加上既信手拈来又可查可考的旁征博引，翻译难度可想而知。

回想起来，三年多前，正是皮亚的虚无主义立场吸引了我，才决定翻译这本书。以前我曾读过萨特写的《波德莱尔》，总觉得萨特是在拿波德莱尔来阐释他的存在主义哲学，那么，一个虚无主义者会不会这么做呢？相信读者会在阅读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，而我则相信，一颗虚无主义者的灵魂更容易亲近波德莱尔的一生，也更容易嗅闻到《恶之花》的芳香。

□何家炜（《波德莱尔》译者）

【远方来客】

玛丽亚 “我们都是《时间的针脚》”

《时间的针脚》
（西）玛丽亚·杜埃尼亚斯 著
罗秀 译
南海出版公司
2012年3月

40多岁才写了第一本小说《时间的针脚》，没有任何宣传和营销就在西班牙卖了超过150万册，如果按照2010年西班牙人口统计，那么平均每30个西班牙人就有一个买了这本书。这就是女作家玛丽亚·杜埃尼亚斯在过去几年里的境遇。近日，她来到中国。

在获得作家这个头衔之前，玛丽亚更习惯的头衔应该是学者，她是英语语言学的博士，还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。这经历难免让人联想起意大利作家安托贝·艾柯，这个著名的符号学家可是在48岁时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玫瑰的名字》。

如果是对世界史有兴趣的人，恐怕对玛丽亚这本处女作的时间背景不会陌生。

在1908年至1956间，和西班牙一洋之隔的摩洛哥的部分领土受西班牙统治，在这段时期，有几千万西班牙人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，抵达摩洛哥。玛丽亚的外公也在这段时间，带着自己的女朋友，到了这片土地，在那里结婚，生育了5个孩子。最小的女儿就是玛丽亚的母亲。这样的背景，让玛丽亚对那段历史很着迷，她想把目光重新投到北非的这片土地上，当她听了家人和身边仍然活着的老一代西班牙人的回忆后，她觉得需要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玛丽亚发现了胡安·路易斯·贝德维格尔，西班牙内战时，这个人曾是西班牙驻摩洛哥的高级专员。这个人物让玛丽亚很着迷，他身上光明和黑暗的一面都很突出，他不喜欢过军人的生活，更愿意表现得像个知识分子和战略家。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，贝德维格尔被佛朗哥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，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便失宠，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。紧接着二战爆发，佛朗哥政府名义上保持中立，实际上是与德国站在一起，贝德维格尔在这个时间却开始同英国人走到一起，背叛了自己的政府立场。

玛丽亚继续研究贝德维格尔，并发现他身后还有其他人物。但玛丽亚并不打算写一部历史小说，所以佛朗哥、贝德维格尔，福克斯、德国人的阵营、英国人的阵营，还有她想谋划的情报活动，都是背景，她决定创作出一个百分百虚拟的主人公。

这个虚拟的女孩名叫希拉，1936年的马德里，处在战前预热中。希拉，这个蓝领阶层的女孩，从某一天开始，生命里出现了一些故事。

在学术界的工作和研究，让玛丽亚对创作这部小说很有帮助，她强调尤其是对文献的严谨要求，在小说里她引用了最真实的历史文献资料，没有为了迎合情节去改造。另外她已经有20年的教学经验，这种一步一步扎实的教学计划，也影响到了她的小说构造，她的小说是步步推进的稳固结构。

如果说希拉的命运在小说里被改变的话，那么玛丽亚的命运在现实生活里也已经被改变。现在她在写她的第二本小说，她不知道等她与大学的合约到期后，自己是否会变成一个全职作家。“我现在的人生就是不停地旅行，推荐我的书。我写完这本小说之后，我也没有想到它能够这么畅销。我现在生活非常混乱，因为时间很难掌握，但是这个改变还是非常健康的改变，重要的是始终要脚踏实地，心怀感恩。这些荣誉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，就像天上流星一样，也有可能持久，当然这取决于你自己，所以要对这些东西有一个平常心，可能升得越高摔得越狠，所以要平淡地看到这一切。”

采写/本报记者 姜妍

责编 于丽丽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张彦君